

戴望舒全集



卷

紀念錄

文

散

詩人戴望舒先生（胡風十八拍）王觀國先生林林
 云：望舒先生四十年來不見其人，其聲名已
 凡十八拍。觀國以為其記要繁瑣，又極力刻新所獲
 伊胡風先生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其文姬所

戴望舒全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散

文

卷

主编：王文彬
金石

纪念

舒望舒全集卷五（胡风十八种）王观国等编目：秦南思记
王：胡风全集四卷，本册是见胡人卷附录等。而次之，胡人成集，为制书。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望舒全集:散文卷/王文彬,金石主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

ISBN 7-5006-2865-X

I. 戴… II. ①王… ②金…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18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24.5 印张 4 插页 540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38.00 元

出版说明

一、《戴望舒全集》收录了戴望舒生前全部的著述和翻译文字,分为诗歌卷、散文卷和小说卷出版。

戴望舒生前出版过《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四本诗集和若干译著及古籍校注。他的散文、随笔和评论没有收集,书信等也只有零星发表。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到香港后的近十年中,他所发表的著作和译著,内地读者也很少知道。一九五〇年二月,戴望舒突然病逝,他的朋友分头在创作、翻译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对其遗稿进行整理,并于五十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戴望舒诗选》、《洛尔迦诗抄》、《小说戏曲论集》等著作和译著。此后是一段较长时期的间歇。粉碎“四人帮”后,戴望舒在文学上的地位逐渐为人们所深刻认识,他的著作和翻译,在国内和域外有了更多的出版。全集就是在此基础上,并得到戴望舒亲属的支持编辑而成。

二、关于体例,鉴于戴望舒一方面自己坚持中文写作,同时兼顾外文翻译的情况,故本书每卷均分两个部分:创作部分,翻译部分。

三、戴望舒的部分书信和《航海日记》、《林泉居日记》系根据原稿,加以注释,编入全集。对于其中明显的文字讹误,作了订正。

四、戴望舒创作态度严谨,精益求精,同一篇作品(特别是诗歌)往往留下不少异文。我们在其创作的诗歌部分的注释中,保留了这些异文,以供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参阅。

五、戴望舒译作中有代表性和富于独特个性的作品基本上已收入全集,个别译作由于著作权益等问题所限,未能编入全集,仅录下篇名和出处,以供参考。

六、戴望舒的译作受时代限制,有些译名与今通译不尽相同,我们采取加注的方式,一则可以保证译本的原貌,二则也兼顾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个别比较明显的不会产生歧义的译名未加注释。

七、作品中有些字、词尤其是数字的使用,编者做了统一的处理;诗歌卷中少量译文后记和作者介绍文字为了研究的方便,放在了译作的文末,而未收入散文卷中。

八、编辑戴望舒全集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戴望舒的著作和译品,不少已失散,钩沉之中,难免疏漏,尚祈读者关心、批评和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和增补。

传 略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翻译家和古典文学研究者。他的一生很短暂，只活了四十五岁，生活道路又比较曲折，但凭着自己良知的选择，终于在他生命的晚年，跨进了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队伍，赶上了迎接共和国的旭日东升。其间他著有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评论、古籍校点和译作，诗歌虽然只创作九十六首，但影响很大，代表了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深刻地反映了一代中国诗人引进西方诗艺，融汇传统，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歌的艺术历程。

戴望舒原名戴丞，字朝窠，小名海山，笔名有戴梦鸥、戴望舒、江思、艾昂甫、陈御月、陈艺圃、张白衍、达士等。祖籍江苏南京，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五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戴立诚，字修甫，原在北戴河火车站服务室任职，后为杭州财政局和中国银行职员。母亲卓佩芝。姐姐戴瑛，小名麓玫，长望舒两岁。望舒幼年曾随父母居住北戴河，七岁时举家返回杭州。给望舒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蒙上一层阴影的事情，是他曾害过一场天花，病愈后

却在脸上留下瘢痕。这场不幸所带来的文化心理的伤害是在他明事以后才显现出来的。嗣后,即使他已成了名重诗坛的诗人,也还不时受到朋辈中人的讥嗤。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成为某一方面的强者,这是他孜孜矻矻执着文学的初衷。他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压抑和苦闷,有唱不完的忧郁之歌,与此大概也不无关系。

戴望舒八岁入杭州蕙务小学读书。十四岁考进宗文中学,学习四年,十八岁时中学毕业。中学四年是他踏上生活和艺术之路的开端。据比戴望舒低一年级的张天翼回忆:“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的。……我们还投稿哩。”^①望舒便是这几位同学中的一个。他先后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债》、《卖艺童子》和《母爱》。鸳鸯蝴蝶派中的苏州小说作者成立了一个名叫“星社”的文学小社团,创办了《星》月刊和《星报》副刊。或者出于模仿,或者基于响应,一九二二年九月,戴望舒、戴克崇(杜衡)、张天翼和之江大学学生施蛰存等人也成立了一个名为“兰社”的文学小社团,并于一九二三年元旦创办了《兰友》旬刊。戴望舒任主编,编辑部也设在戴家,直到同年七月一日停刊,共发行十七期。望舒此时发表的诗文,虽然运用的是陈旧的语言和表现形式,但抒写的却是一个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稚气中透露的是严肃。

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甫近,望舒从《觉悟》副刊上看到上海大学招生的消息,于是和施蛰存一同进入该校。上海大学名义上由国民党元老担任校长,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主持校务。校舍虽然

① 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五月。

简陋，“精神却是全国最新的”^①。望舒在文学系学习，兼听社会学系的课。同学中较融洽的有丁玲、孔另境等人。文学系的老师有陈望道、沈雁冰（茅盾）、田汉、方光焘、胡朴安、刘大白等，最近的要算沈雁冰，望舒和施蛰存“经常到他家里来谈天和讨教问题”^②。望舒进校学习近两年时间里，不仅接触了社会科学理论，结识了进步的和革命的师友，而且也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宣传工作：一片新的天地在他眼前展现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上海大学被封，校舍被英国海军陆战队占为营房。同年秋季，望舒转到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准备将来留学法国。随后施蛰存、杜衡也相继投入震旦。震旦是一所教会大学，在神父指导下，望舒读了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法国浪漫派诗人的作品。法国象征派的诗，神父是禁止阅读的。青年人总是好奇的，望舒在课堂上读的是浪漫派的作品，枕头底下却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的诗集，并且终于从象征诗派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其间，他同施蛰存、杜衡创办了《璎珞》旬刊，编辑部设在施蛰存的松江县的家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七日，共发行四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望舒因参加共青团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遭到通缉，在风声鹤唳中离沪返回家乡杭州。

在大学读书的四年期间，望舒一边写诗，一边阅读和翻译魏尔伦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其中有的创作和译作发表在《璎珞》旬刊上，开启了他对中西方诗歌传统的承继、贯通和创新的最初阶段。一方面，他对于诗的基本态度已露端倪，认为“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讲，它底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和隐

① 施蛰存：《刘大白选集序》，《文艺百话》第三三四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四月。

② 孔另境：《庸园集·怀茅盾》，永祥印书馆，一九四六年。

藏自己之间”^①。另一方面,魏尔伦诗歌中的迷人的音节、朦胧的色彩和亲切暗示的特点,又与之切合。其诗风在两种传统的汇通中开始转变,《雨巷》是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名篇。叶圣陶曾赞许它“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望舒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雨巷》写出不久,戴望舒就不满意那太像诗的写法,《我底记忆》的创作,是诗人诗艺新的推进。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侧重于字句音节和韵脚形成的节奏已经消退,在经过锤炼后的清新自然的口语和疏密有致的意象排列中,流动的是诗人情绪的旋律,个性的音乐,形成一种富有旋律感的诗体。这种诗体,虽说是借鉴象征派后继人保尔·福尔、耶麦、果尔蒙的无韵自由诗体,但却是诗人的独创,是一种“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色的白话新诗体”^②,首开了诗歌散文美(或口语美)的风气,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至此,诗人的艺术走向成熟。

戴望舒创作《我底记忆》的时候,和杜衡匿居松江县施蛰存家中,他们在一起从事创作和翻译,并戏称为“文学工场”。在最初的几个月,望舒便译成了夏多勃里昂的《少女之誓》。一九二八年初,冯雪峰为逃避北洋军阀的追捕,从北平南下松江。他的到来,给这个“文学工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四人商议,决定办一份名为《文学工场》的刊物,也曾编好两期,但因为刊物内容明显左倾,书局老板不敢付印而告终。一九二八年夏初,望舒和施蛰存应刘呐鸥的邀请,来到上海共同筹办杂志和书店。九月十日《无轨列车》半月刊问世,但仅出了八期,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由而禁止出版。一九二九年初,他们创办了水沫书店。四月一

① 杜衡:《望舒草·序》。

②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戴望舒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

日,戴望舒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该书店出版。诗集收入诗人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间的诗作二十六首。在“文学工场”期间,诗人追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集中多为爱情诗,抒写了诗人初恋时的温馨和烦忧,也留下了诗人在诗艺上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探索的脚印。诗集出版后,被誉为给“中国新诗开出了一条新路”^①。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他们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到次年四月,又遭禁止。此间,在鲁迅的指导下,戴望舒和冯雪峰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改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戴望舒所译的苏联伊可维支的《唯物论的文学论》是其中一种。一九三〇年三月,戴望舒由冯雪峰介绍参加了“左联”,他的两首讴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诗篇《流水》和《我们的小母亲》,即写于此时。但是,不久他便悄悄地疏远了“左联”。

造成望舒文学道路的转折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艺术的原因的。据施蛰存回忆:“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②这一转折的明显标记是以施蛰存为主编,戴望舒、杜衡任编辑的《现代》月刊的创办。施蛰存在《创刊宣言》(创刊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中说:“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戴望舒应承难以兑现的爱情预约,坐

① 保尔(徐霞村):《一条出路》,《新文艺》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九年十月。

② 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开始了他为期三年的游学生活。他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亦曾到巴黎索尔邦大学旁听,过着清贫而紧张的生活。戴望舒在给叶灵凤的信(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中说:“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这期间,他先后翻译了《法兰西现代短篇小说集》、《比利时短篇小说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西班牙短篇小说集》和《苏联文学史话》等,同时还编定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并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诗集共收诗作四十一首。施蛰存说:“《望舒草》的编辑,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①。在游学期间,他支持国际作家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参加了法国文学家召开的抗议法西斯大会。一九三四年八月他到西班牙作短暂的旅行。此行,一方面是为了领略西班牙的美丽风光和悠久文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国际作家反法西斯运动表示同情和声援。整个游学期间,他更多的是,广泛地吸纳艺术新潮,寻书访书,出入图书馆和书肆,与诗人、艺术家广交朋友。他对法国诗人许拜维艾尔说:他的爱好是这样驳杂,“或许是韩波和罗特亥尔蒙;在当代人之间呢,从前喜欢过耶麦、福尔、高克多、核佛尔第,现在呢,我已把偏好移到你和爱吕阿(今通译为艾吕雅——引者)身上了”。“我所爱的西班牙现代诗人是洛尔迦和沙里纳思。”^② 艺术兴趣已由象征诗派转到其后裔现代派,特别是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

一九三五年三月,戴望舒因为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游行,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四月,来到上海,和早已移情别恋的施

① 施蛰存:《戴望舒诗集全编·引言》,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

② 戴望舒:《记诗人许拜维艾尔》,《新诗》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十月。

绛年解除婚约。一九三六年六月,与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诗人徐迟担任他们的傧相。“抗战未发动前,我们底诗坛上曾经有过一次剧烈的论战:所谓‘纯诗’与‘国防诗歌’。”^①一九三六年十月,戴望舒邀请徐迟、路易士两位青年诗人协助,与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和冯至共同创办《新诗》杂志,刊行十期,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共发表诗歌和论文三百五十多篇,显示了他们对“纯诗”的响应和推进。这期间戴望舒创作七首诗。顺应诗人诗学思想的变化,诗歌由表现情绪拓展到在巨大历史苍穹下对自身存在精神状态的思考,抒写他的寂寞、虚无及对人生的永恒期许,诗的体式大都是趁韵和半趁韵格律体,诗行和诗节也较匀称。一九三七年一月,戴望舒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出版。这个诗集基本上是《我底记忆》和《望舒草》两个诗集编年的合集。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次年五月,戴望舒全家和徐迟、叶灵凤全家一道来到香港。同年八月一日,他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出版。他在《创刊小言》中说:

《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上,编者和读者都盼望着这阴霾气候之早日終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如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唯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责。

^① 梁宗岱:《论诗之应用》,《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四十三期,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

他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之中。在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前，英国当局为了维持英日关系，对抗日行动多加防范。望舒后来回忆说：“给我最大最多的麻烦的，是当时检查制度。……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唯一的目標。”“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检查官的‘冷战’。”^①他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坚持宣传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报告抗日战士英勇斗争，使《星座》好像“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着”。一九三九年三月，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文协”香港分会为适应环境而改称）干事。一九三九年七月，他和艾青主编《顶点》诗刊，在创刊号的《编后杂记》中写道：“《顶点》是一个抗战刊物。她不能离开抗战，而应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为此之故，我们不拟发表和我们生活着的向前迈进时代违离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得声明，我们所说不离开抗战并不是狭义的战争诗。”“我们希望把水准尽可能地更提高，使中国新诗有更深邃一点的内容，更完美一点的表现方式。”这不仅是他们的编辑宗旨，也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于诗歌新的美学观点。一九四〇年四月，他在郁风主编的《耕耘》杂志中担任编委。夏初，根据茅盾的要求，又与叶君健、徐迟、冯亦代编辑出版向海外朋友介绍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中国作家》（英文版）杂志。一九四〇年，与穆丽娟分居，穆丽娟携长女回沪。在这期间，戴望舒的创作热情高涨，写诗，翻译，同时还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就其数量而言，也是一生最多产的时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香港。戴望舒因为舍不得丢一屋子好书，滞留香港，从此踏上在苦难和屈辱中等待解放的岁月——三年零八个月。其初，

① 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星岛日报》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将诗人逮捕入狱。铁窗的腥风血雨虽然损伤了诗人的身体,但却锤炼了他的斗争意志,他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等一系列战斗的篇章,抒发自己视死如归的豪情,和对正处于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的祖国和人民的怀念。《我用残损的手掌》是其中优秀的篇章。五月,戴望舒被保释出狱,到大同图书印务局编辑部任编辑。其间也与狱中难友合伙开设“怀旧斋”书店,因不善经营,不到四个月便倒闭。一九四二年五月,与杨静(丽萍)结婚。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与叶灵凤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发行七十二期。在第一期《给读者》一文中,编者说明缘起:“我们敢于尝试的原因,就是知道有许多文艺爱好者正如我们一样,沉默太久,有一点不甘寂寞”,想借此“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友人,带给远方的故国”。望舒在周刊上发表近六十篇作品,其中以译著居多,间或也有诗歌和随笔的创作。诗歌中的《等待》、《过旧居》、《示长女》、《萧红墓畔口占》等,都是幽婉沉郁的名篇(有的篇章于此时创作,抗战胜利后才发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戴望舒接到老舍来电,积极参加恢复香港文协的活动。

整个抗战期间,戴望舒创作了十九首诗,其中有十六首后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经过民族斗争的考验,屈辱和困苦的磨练,诗人对于现实和民族苦难有了更深层次的体验,使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穿过狭小的感情天地,走向大地,走向人民,呈现出新的灿烂。苦涩逐渐消退,幽暗的寒意让位于温润的光亮。诗中仍然大量运用比喻,但大多是明喻和拟喻;也运用象征,但内涵较稳定,虽然减少了暗示朦胧多义的魅力,却增添了明朗隽永的风致。在这些诗篇中尽管可以看到波特莱尔、瓦雷里、许拜维艾尔、

艾吕雅、洛尔迦和西班牙抗战谣曲的影响,但却是戴望舒自己的声音。他仍然敞开胸怀“深度地”接受外来的艺术新潮,并努力寻找与自己艺术个性的契合点,使业已形成的艺术风格在新的创作中达到新的境界。

一九四六年三月,望舒携妻女回到上海。他先后在新陆师范专科学校教中文,在暨南大学教西班牙文,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音韵学。同千百万善良的人们一样,他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激动。虽然在贫病交困中,他还说:“不管它,现在可以自在地工作了。”^①一九四七年三月,他出版了《〈恶之花〉掇英》。在《译后记》中,望舒总结了自己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借鉴以波特莱尔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的艺术经验:“至于影响呢,波特莱尔可能给予的是多方面的,要看我们怎样接受。只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也许反而是可喜的。”一九四八年二月,戴望舒的第四本诗集《灾难的岁月》出版。诗集收录二十五首诗,其中诗人旅法后期到抗战前的诗篇九首,抗战期间的诗篇十六首。这个诗集标志着诗人的思想和诗艺的发展。这期间,面对独裁政权的倒行逆施,诗人很快发现灾难的岁月还在延伸着。他基于义愤,坚定地走上街头,同青年学生一道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一九四八年五月,诗人再度流亡香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望舒这时已看清了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断绝了犹豫和顾虑,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他毅然离开香港,冒着风险来到北平,跨入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的行列。

^①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龙套集》第三十九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组织上先把望舒分配到华北军政大学第三部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底,他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把他调至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在革命岗位上,他努力学习新事物,忘我地工作着,表示要改变过去的创作方向,为新中国放声歌唱,并且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旧社会束缚下未能充分发挥的才能,正在显示出来。只要假以天年,他一定会谱写出更动人心弦的诗章。但是,正当诗人人生的历史展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他的哮喘病加剧了。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诗人于北京逝世。

戴望舒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的一生。和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诗人、作家一样,他生活在一个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他了解西方现代诗艺,又谙熟中国诗学,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杰出的艺术才能,正直、诚实、温厚,向往革命,热爱祖国,渴望美好的生活,但却又害怕斗争,耽于个人感情的小天地。因此,尽管真理的火光曾常常在眼前闪耀,他往往追随几步之后又退缩下来,一再蹉跎,感到孤独、忧郁乃至绝望,直到抗战以后,他才从个人的小天地走到苦难的战斗的人间,逐步把向往革命和热爱祖国的愿望付诸具体实践,思想和艺术出现了一个飞跃,成为“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①。他逝世以后,他的著作陆续再版,其中有《洛尔迦诗抄》、《小说戏曲论集》、《戴望舒诗选》、《伊巴涅思短篇小说选》、《戴望舒诗集》、《高龙芭》、《戴望舒译诗集》、《戴望舒诗全编》、《爱经》、《紫恋》、《戴望舒》和《戴望舒卷》(台湾版)、《西班牙短篇小说集》(台湾版)、《戴望舒文录》(香港

^① 胡乔木:《悼望舒》,《人民日报》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

版)等。现在又出版了《戴望舒全集》,可以说是在更大规模上整体地显现了戴望舒的贡献。他的诗文、译著和论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